

张家伟 1941年7月生于上海，初中学历。1980年前收集过邮票和火花，之后开始收集烟标及烟草文物，并对烟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发表过近百篇烟文化论文和文章，出版了《世界烟标集萃》、《话说烟草》、《中国烟标文化图鉴》等8部专著和民俗学、旅游学书籍近30部，他的藏品由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中国烟标艺术》和《世界烟标艺术》两部烟文化电视资料片，并由赵忠祥解说。他的艺术收藏获国际收藏家协会等组织授予的“国际金奖”殊荣和“世界名人”称号，并被《中国收藏界名人辞典》等20多部名人辞典收录。

张家伟目前已收集到186个国家的10万种烟标和300多种烟缸，曾在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秦皇岛万博文化城、南京博物馆、安徽省体育馆和苏州多处旅游景点举办过个人藏品展览。

张公烟佛

林家治

收藏，古今中外都有。然而，在许多人的眼里，真正有收藏价值的物件是书画、古玩、文物之类，而且年代越久远就越有身价越是值钱，也就越蕴含文化与艺术价值。许多国宝便是从中而生。

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门洞开，人们才知道还有许多东西都有收藏价值。邮票、门券、报刊、钱币等都是世界性

的收藏物品，也还有大量随着这一思路生发出来的收藏品，既有中国特色的，也有地方色彩浓烈的收藏品，如铜镜、小鞋、手炉、扇子、磁卡、名人手迹、梳子、笔、墨、砚台等收藏物，都能撑起一片天地，让人大开眼界，大长知识。

当然也还有烟标的收藏，这是具有世界性的收藏物。因为各国各地都生产香烟，是香烟都会用烟壳子来包装，烟壳上要印制形形色色的图案、文字，这就是烟标。各国的烟标有各国的特色，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产物。

我问身边坐着的“烟标大王”张家伟：“这烟标有什么好收集的？它真有什么收藏价值吗？”

这位今年 60 岁的“烟标大王”，壮实、简朴，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很有精神地说：“千万别小看了这些烟标，它们都印记着每个时代的烙印，从内容、构图、色彩、印制的工艺水平都栩栩如生地袒露在人们面前。举例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 50 年代生产了‘抗美援朝’牌香烟，60 年代生产过‘三面红旗’为烟标的香烟，70 年代又生产了‘红舞’牌香烟，80 年代改革开放了，又生产‘聚宝’牌香烟。这些香烟的烟标，不仅帮助大家了解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各个年代的特点和风貌。”

“这千姿百态的烟标图案汇集在一起，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更是广大搞装潢、广告、美术设计人员的良师益友。这些人只要一发现有这方面的书刊，就会买来借鉴，不少人自己也集这些烟标。所以讲，烟标的设计与制作，实在是多门学科汇成一体的一门边缘学科。”

据我所知，张家伟收藏烟标的时间并不算长，也就是从 1980 年开始的，那时他已是 40 岁的人了。然而，他认准搞收藏的人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他以为只要认定方向大于

一番，什么年龄开始收藏都应当看做是最佳年龄

张家伟不抽烟，连烟壳的长度尺寸都不知道，对装潢设计更是一窍不通。然而，他经过 20 年的业余学习、钻研，持久不懈地努力，终于以收藏了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 万种烟标而脱颖而出。

“听说你的烟标收藏被评为全国烟标界第一，许多人还称呼你为‘烟标巨子’、‘张公烟佛’。那么凭什么来评定第一、第二呢？”我问。

“烟标收藏者这些年激增，全国大约有 5 万多人收藏烟标，因而各地都成立了烟标收藏的社会团体，平均每两年评定一次。评定的标准有二：一是数量与品种，二是烟标的质量。所谓质量，就是所收藏的烟标珍贵的稀有品种占多少，还有就是各国有代表性的烟标品种又有多少。像日本的旅游观光系列烟标有好几百种，一般人要集全就比较困难。还有就是要评定收藏者的研究水平如何，光收藏不研究就无法提高收藏水平，这常常可以从一位收藏者参展的作品中看出来。有的参展作品按内容、系列、专题、工艺设计、广告效果等进行‘竞相’，这就体现了收藏者的研究水平。后来，我被《收藏》杂志评选为全国第一，成为中国烟标界名列前茅的收藏家。继而，《人民日报》海外版、《信息日报》、《深圳特区报》等全国几十家报纸对我进行了报道，我一下子受到国内外收藏家和读者的广泛瞩目。

“我想，既然烟标也能为国争光，而我的目光是冲出世界，因为烟标收藏是世界性的，所以我向国际收藏协会作了申报。经过评定，我被评为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烟标收藏家克劳地沃。克劳地沃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书信来往，互通有无。我很清楚，克劳地沃的烟标收藏是家族性的，他的祖父就是烟标收藏家。世界烟草史从 1902 年英国

生产第一包烟开始正好 100 年历史，而克劳地沃家族的收藏几乎也有这些年了。因此，他的烟标收藏质量是我们目前无法超越的。但是，他共收藏了 12 万各种烟标，从时间上我超过了他。因而，我幸福地荣获了国际金奖。

“我成功了！许多人想知道我成功的奥秘，说来也心酸，因为我的成功是始终伴随着艰难……”

从垃圾箱里捡起

张家伟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苦难的童年。他出身上海，父亲是个小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生养了 7 个兄弟姐妹，生活十分拮据。母亲病故后，幼小的张家伟随养母迁居苏州郊区的乡镇，养母每天靠接麻线的头，挣得两角钱来供养张家伟的生活与读书。

苏州的乡镇生活虽然清贫，但也十分清静和安定。这使幼小的张家伟的某些特长得以施展。他自小喜欢绘画，特别是写生画，每逢放假了，他会面对着壮美的大自然涂抹一天。他还喜欢收藏，什么邮票、钱币等，捡来的讨来的，他都用小罐子收藏起来，觉得十分有趣。有时，他也会帮助养母接接线头，做些家务杂活。他一边做一边思忖，穷人为什么这般受苦？难道穷人的一辈子都该是这样过完的？难道他们没有自己想做的事？也没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这些疑问，像永远也解不开的迷团，笼罩在张家伟幼小的心灵中。

后来，养母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张家伟的生活成了问题。初中毕业后，张家伟再也无法读书了。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四处寻找工作，做过各种体育比赛的记分员，也当过手工制作书签的个体户，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

张家伟 18 岁那年，进入了一家炼染厂当工人。赤、橙、

黄、绿、青、蓝、紫炼就匹匹绸缎，挺有意义，也使他的生活有了保障。不久，他又参了军，3年的空军战士的生活，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增长了他的见识。复员回来，他仍然当炼染工人。直到1980年，他已是成家立业40岁的人了。他有一双儿女，爱人也是工人。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却也安定而尽享天伦之乐。只是张家伟始终感到焦心和不甘的是，难道说自己的一生就这样简简单单、平平凡凡地度过吗？苦惯了的张家伟并不是因为穷而想拼命地致富，他对金钱没有那么多贪婪，只要够用也就可以了。使他不甘心的是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机会得到有效释放，他坚信自己具备这种能耐，或许抓住了某个机会经过奋斗能够做成功一二件事。这样，也不枉在这个世界上“跑”了一趟。所以，他积极地期待着，用明镜似的双眼观察着，不放过任何可以让自己驰骋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被禁锢的思想开始获得解放，各行各业都在放开手脚，按照原来本应有的规律运行起来了。1980年5月的一天，张家伟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河南开封厂登载了一条征求香烟装潢图案设计的启事，酬金优厚。张家伟怦然心动，觉得自己的绘画还可以，何不一试！为了搞好设计，他向抽烟的朋友讨了一些烟壳，自己又捡了一些，他将一只只烟壳拆开后，张贴在白纸上，便敞开想象的翅膀勾勒起来……

经过几天的熬夜，张家伟第一次设计的烟标图案终于诞生了。共画了9张，内容大多是富有中国民间传统色彩的题材，如红灯笼、年画、五谷丰登等。他像侍弄自己儿子似地小心翼翼地包装起来，寄了出去。然后，期待着喜讯的来临。

然而，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寄出去的设计

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正当张家伟有些焦急之际，终于盼来了开封卷烟厂的来信。原来，他设计的图案稿未被采用，却寄来了许多各种各样崭新的烟标。他被这些设计新颖、图案美观、装潢大方的烟标深深地吸引了。他观赏着烟标，心里反复琢磨起来：“看来要设计出好的烟标，必须要收藏烟标，研究烟标！”

一个大胆的选择在张家伟心底萌生：用业余时间收藏尽可能多的烟标。

先是讨，向亲戚朋友、向厂里许多吸烟的工友讨。

由于大多数吸烟者没有集藏烟标的习惯，烟抽完壳子就随手丢了。讨来的烟标毕竟太少，收藏的速度太慢。张家伟下定决心到马路上去捡！

他真的去了！这位壮实得像牛一般的汉子，每当下班之后、节假日，都能在工厂附近、住宅左右，甚至在垃圾堆里见到他弯着腰、仔细地寻找拾掇的影子。他那贪婪的目光就像《百万英镑》里的亨利·亚当，恨不能顷刻之间拾尽世界上所有的烟壳子。天太热了，衣衫早被汗水湿透，湿透了晒干，晒干了又湿透。太阳西落之际，他的上半身探进了垃圾箱固执地寻找着。

一位穿着入时的妇女对着张家伟瞧了好久，禁不住掩嘴笑了：“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男子，捡一些拖鼻涕小孩才玩耍的东西！”也有的人在他身后指指点点：“这位老兄莫非搭错了神经，竟会不顾一切地捡纸头！”

这些话不可能不传到张家伟的耳朵里，他脸红过，也犹豫过，但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决心。他想：“这些话无非是要把自己逼回到原来的地方，什么也不要干，这是不可能的。要办成一件事是难的，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让他讲去吧，我照干不误！”

他把寻拾烟壳子的范围扩大了，像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园林、名胜景点、饭店宾馆等，都成了他重复搜寻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外地人多，会带来各地生产的烟标。

过了些时间，张家伟的目光又开始瞄准全国各地的卷烟厂。

“为什么？”我有些不明白，“难道烟厂能为你提供烟标？”

“按常规讲，作为一家烟厂，凡生产过的香烟，都会留存一部分烟标。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向他们索要或购买一点，希望总是有的。”张家伟朝我笑笑，眼里分明闪烁出几分智慧的目光，“我算过一笔账，当时全国县以上的卷烟厂达 600 多家，如能如愿弄到他们的主要烟标，那么国内大部分的烟标就比较齐全了。”

访问这位张公烟佛前，我凭着人家的介绍在猜想，这位张公收藏烟标的历史只有 20 年，已能独占鳌头，显然是走了捷径。此刻，张公的一番介绍，我才明白，凭智慧、勤奋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任何一点希望也不放弃的精神，才使他成功的速度大大加快。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各式各样的烟标如雪片般朝他飞来，有些烟厂还给他寄了珍贵的资料。张家伟在住宅客厅的墙上，贴着一张烟标收藏进度表。这些日子，只见他的烟标收藏数量，就像坐了火箭直线上升，一百、一千、一万、二万……

面对五颜六色、一堆堆的烟标，张家伟并没有陶醉，更没有手忙脚乱。他按烟标生产的年代、图案的类别以及设计的特色分门别类，存放至已制作好的一只只小木盒内，还在木盒上贴上标签，以便查找。

反反复复的查找，却使张家伟生出了不少苦恼。原因是

许多烟标他并不能识别，一些烟标图案的含义、工艺制作的特色、包装装潢的风格等都是一知半解或根本不理解。这种状态，即使收藏了再多的烟标，不能驾驭它们，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想法，促使张家伟进了中国包装装潢函授大学的校门。他觉得自己需要充电，需要专业知识的滋润，却遭到了爱人的非议：“这一把年纪了，集烟壳子也就集了，还为这烟壳子去读书，犯得着吗？”

“这你就不懂了，这小小烟壳子却大有学问。”张家伟将一叠烟壳子递到爱人身旁，耐心地解释道，“你看看这只由武汉卷烟厂生产的‘白金龙’烟，为什么要画一条龙呢？”

爱人笑了笑，摇摇头。

“封建社会里，‘龙’是权力的象征，历代帝王都有以龙自喻的习惯，可是现在不同了，‘龙’已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象征。”

张家伟又取出一组烟壳子，“你看，现在，我们国家已生产出的以龙为题材的香烟有好几十种，像‘龙’、‘龙牌’、‘玉龙’、‘海龙’、‘云龙’、‘红金龙’、‘龙山’、‘龙凤’，还有台湾生产的‘金龙’牌香烟。这说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中国的统一是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可是，为什么要设计出神态各异的龙？哪种龙的姿态最有代表性？我也讲不清，不继续学习读书怎么行呢？”

爱人再也不吭声了。事后，她把所有的家务都默默地承担起来，好让胸有大志的丈夫一门心思地侍候这些烟壳子。

烟标是百科全书，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张家伟上函大的同时，开始了自学。他学习世界烟草史、世界美术史，学习美学、消费心理学、市场学、构图学、历史学、世界地理等。每天都要读书到深更半夜，有时，一直读书到天亮，

干脆洗把脸、吃点早饭上班去了。他对英文、日语很生疏，就专门请教擅长外语的朋友。上下班路上、中午工余休息，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背诵一段外语，默记几个单词。后来，他在《自学》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常州戚墅堰医院外科主任王三南自学日语的事迹，他激动万分，急忙利用节假日坐车登门求教。俩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并约法三章，以后，凡日文烟标资料由王三南代译，张家伟则将有关卫生保健资料传递给王三南。这使张家伟的日语水平大有提高。

把目光投向世界各国

在许多人的眼里，收藏家与富有者之间常常是划等号的。当我问及张家伟是否成了富翁时，他连连摇手，语气极平缓地说：“收藏家不一定就是富翁，就拿我来说，收藏的是烟壳子，值不了几个钱。就算是稀有珍贵的品种，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买来或交换来，如果又转手卖掉，即便赚了些钱，但名品烟标没了，影响我的收藏品质量，这是我所不愿意的。

“搞烟标收藏，非但赚不了钱，反而要时时倒贴钱。我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基础，也没有在经济上得到过任何‘外援’这也给我的收藏带来不少困难和遗憾。有一回我在同乡手里发现一只祖传下来的烟标，经仔细辨认，这是民国时期的烟标，这枚名为‘三伟人’的烟标上，印有孙中山、蒋介石、孔祥熙三人的头像，十分珍贵，是一只极品烟标。我很想收购下来，但对方开价要1500元。虽说这只烟标也值这个价，但我一时拿不出这些钱。回家后和妻子商量，七拼八凑才把钱聚了起来。‘三伟人’到手后，我连忙

整理出简要档案存放起来。谁知不到 3 个月，人家把钱退给我，要回了‘三伟人’。原来，一位外商收藏家愿出 1 万元购买此枚烟标，我理解对方的心情，我又出不起这个价，只好就此作罢。但我心中却隐隐作痛，这么珍贵的烟标就此流落到海外，实在是太遗憾的事情……”

张家伟作为国内第一流的烟标收藏家，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民”。但这始终也没有动摇过他收藏烟标的信念。他的目光开始有重点地、战略性地转移到世界各国，这种转移的理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烟标的集藏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在一定程度上，国外的烟标天地更广泛更丰富多彩。不能收藏世界的烟标，这个烟标收藏家是极度残缺不全的，也是受之有愧的。

这是张家伟烟标收藏的重大转折，也是他集中力量打攻坚战的最好体现。然而，想得到的事情做起来却很难。张家伟在国外既没有亲朋好友，也没有实力去周游各国，怎样把国外各种烟标集藏到手呢？

也许是命运早在冥冥之中有了安排，张家伟在一次参观集邮展览时，不经意中发现有位日本的集邮家，名叫水原明窗，他集藏展出的中国邮票竟比不少中国集邮家的邮票还多还精彩。张家伟一边观赏一边琢磨，一位日本朋友能把中国邮票收藏得这么好，我作为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把日本的烟标也集藏起来？他终于在一张实寄封上读到了水原明窗的通讯地址。

回家后，他即刻给水原明窗写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收藏情况，信中夹寄了 30 张中国烟标，希望水原明窗能转送给喜欢收藏烟标的日本朋友。

就这样在一次偶尔的书信中，竟然架构起张家伟与国外烟标收藏界朋友们的友谊桥梁。

说来也巧，水原明窗虽不收藏烟标，但是他的助手印南博之是位烟标收藏家。印南博之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文系，以后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他收藏烟标也是将烟标作为窗口来透视中国，自然是一位“中国通”。当水原明窗将张家伟的来信和中国烟标转交给印南博之时，他高兴极了，忙给张家伟写回信，要跟张家伟交朋友，寄来了许多日本烟标，还向张家伟介绍了一批国外集友。在信中，印南博之还问及了一只叫“424”的中国烟标，其装潢设计是什么意思？为啥要用“424”这个数字作为香烟的牌号呢？

这一问，可把张家伟问住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424”是什么意思，一种惭愧和不安涌上心头，驱使他连忙写信给烟厂求教。

一个月后，印南博之收到了张家伟的回信：“……4月24日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日子，‘424’烟标是为纪念这个日子而设计的。”

以后，张家伟凡集到弄不明白意思的烟标，非刨根求源弄它个水落石出不可。海林卷烟厂生产了一只“帛画”的烟标，为了弄懂“帛画”的意思，他赶到图书馆先后查阅了郭沫若先生写的《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孙作云先生《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帛画考》等文章，还走访了一些专家，才弄清楚了帛画的含义，对帛画的出土地点、时间以及相关的人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当电影《少林寺》风靡了整个华夏大地，紧接着又很快风靡东南亚和日本时，河南郑州卷烟厂适时出品了“少林寺”牌香烟。张家伟很快将这只烟标集藏到手，并及时将多余的“少林寺”烟标寄给了印南博之，并在信中较详尽地介绍了少林寺的历史、典故、现状以及这张烟标的设计。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印南博之看后

赞赏张家伟的介绍，当即将介绍译成日文，推荐给日本的《烟趣》杂志，结果文章发表了，还将“少林寺”烟标作为插图一并刊出。

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日本的许多烟标收藏家和爱好者纷纷写信给张家伟，要求交友，要求交换烟标，意大利、巴西、阿根廷等不少国家的烟标收藏家也来信希望能结识张家伟。

这样一来，张家伟收藏世界烟标的局面打开了，但一天上班后回到家，不是看信就是复信，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把吃饭、休息的时间也挤掉了。

看着存放在小小办公桌上的一叠叠信件，妻子再也忍不住了：“你就不能少回几封？傻大哥似的，整天伏在桌子上写信，天底下有几个像你这样的？”

张家伟轻轻一笑，委婉地说：“不能啊，你要知道，我现在和外国朋友通信已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交往了，我是以一个中国收藏家的身份在和他们来往，他们来了信，要是连信都不回，人家对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又会怎样想呢？”

话是这么说，但日益超支的邮资像一座小山压在张家伟的眉头。那时，他一家4口人，他、妻子和一双儿女。儿子与女儿都在中学读书。全家的生活就靠他和爱人100多元工资维持，日常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家里惟一能称得上现代化的一点东西，就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给国内外藏友们写信寄烟标，每月都有200多封信要写，多的时候一天就要写20多封回信，按当时8分钱国内邮资算，平均每月要支出30多元，加上10多封国际信件，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张家伟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是万不得已，决不去拖累家庭的生活和一双子女的必要开销。然而，没有钱是不能打

发走这些信件的。他只得把主意打在了自己的自行车上。好在家离厂不远，走着上班还锻炼身体呢。他终于把自行车卖掉了，以解决邮资的燃眉之急。

没有多久，张家伟又将目光落到了那台八成新的黑白电视机上。那天晚上，儿子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电视剧《姿三四郎》，那得意的神情足以令做父母的感到欣慰。他犹豫了好一阵，压下了自己的想法。

第二天下午，乘儿子不在家，张家伟狠了狠心，将电视机抬走了。当他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里，口袋里那 180 多元钱像系着一个什么重物坠在自己的心上，感到难过极了，简直无颜见妻小。

傍晚，放学回来的儿子走到张家伟跟前，吼了起来：“爸爸，今天晚上姿三四郎要到弦道馆去找矢野了……”

张家伟搂着儿子默默地捋着儿子的头发，鼻子有些发酸：“儿子，你学业很重，电视就不要看了，等你初中毕业，爸爸给你买台彩电……”

经济上的磨难，生活中的苦涩，张家伟都可以承受。有时，精神上的折磨，却把他弄得十分狼狈。由于改革开放没有几年，许多陈旧的观念和习惯看法依旧很顽固。海关和邮局见张家伟有那么多与国外往来的信件，产生了不少疑点。一天，上海海关终于把张家伟请到了上海。一位工作人员把张家伟唤到办公室，取出了一叠厚厚的信件，扔到办公桌上。不咸不淡地说：“张先生，这都是你的吧？”

张家伟看看信封上的外文地址和姓名，连声说：“是，是我的！”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信件，信封里究竟是什么？”工作人员终于按捺不住把疑问和盘托了出来。

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家伟原以为要他把这些信带回去，没

想到海关怀疑自己，便耐心地解释道：“我是收藏烟标的，与外国朋友交换烟标，不信，你们可以把信拆开来看！”

“那我们要检查了！”工作人员说着，就将 10 多封信一封封拆开，见果真都是烟标，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扭头走了。

水没有喝上一口、连椅子也没坐一下的张家伟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检查、这态度分明是怀疑自己是“里通外国”嘛，幸好当面有了交代，否则，这黑包袱不知要背多久。

从那以后，张家伟与国外藏友的书信往来顺畅得多了。

我多次到张家伟家中去聊天。那真是一个烟标的世界。在他那不大的房间里，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道：“墙两边的四只大橱全是存放烟标的，橱改成抽斗式的，便于分类存放。”我发现，每只抽斗上都贴有编号或标记。墙上挂的、写字台上压的、枕头旁放的全是令人目不暇接的烟标，在他的收藏室里，有个自制的圆盘计数器，上面显示着他的烟标收藏数字。他收藏烟标的速度，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后来的几年中，他平均每月要收藏新烟标达千种以上。

我又发现，张家伟收藏的烟标中日本烟标居多，“这是为什么？”

张家伟喝了口水，神采奕奕地说：“这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收藏方法来讲，我一下子不可能面对很多国家很多朋友，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收藏的突破口，通过深度来体现广度，或许是一条捷径，事实证明这条路子走对了；二是因为日本是世界四大产烟国之一，这也是主要原因。早在 1904 年，日本便成立了全国性的烟草专卖业——日本专卖公社，一直到现在。日本最早的卷烟叫‘金蝙蝠’。以后发展到五种类型：普通型、纪念香烟、观光烟、地方局烟、出口烟。所谓普通烟，是一种突出牌名、具有公社标记、使用

时间长、生产量大的常见香烟。像日本的‘777’、‘七星’等都是此类型。纪念香烟是一种为纪念国内外重大事件而生产的香烟，包括生肖烟、贺年烟等，已生产了 3800 多种。观光烟是一种由观光区域生产的特种香烟，是日本的旅游纪念品之一，观光烟每年要生产 100 至 300 种。地方局烟是公社委托地方局经办的香烟。这种烟从装潢到制作真是五花八门，其公司创办多少年月、某商店开业、某人结婚纪念、某建筑物落成都可以成为烟标内容。烟标数量上有 20 支装，也有 10 支和 5 支装，还有 4 支装；有种烟叫“明治的月壳”是 1 支装，不过这种烟只能送不能出售。全国每年至少发行一二万支。出口烟包括海运和航空部门发售的免税香烟和普通烟两种，装潢上使用英文或销售国文字，没有日文。常见的有‘MILD SEVEN’、‘峰’等，主要销往中国、美国及欧洲。

“由于日本烟标丰富多彩，我又有幸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所以收藏的日本烟标也很多。日中友好协会仙名分会副会长海道十四治先生，是个事业辉煌的人，他拥有好几家建设株式会社，自己又是一位极有造诣的烟标收藏家。我与他结识后，经常书信来往，互寄烟标，交流心得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每次张家伟在国内开个人烟标收藏展览会，海道十四治先生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总是必到的贵客。他详尽地观看了我的烟标，给了很高评价，还鼓励我再接再厉开辟收藏烟标更高更广阔的领域。在他老人家的帮助下，我竟集齐了日本的观光纪念系列烟标珍品。由于这一系列由 8000 多种烟标组成，一般收藏者难以集齐，而我集齐了一整套。在日本有两位收藏家各集齐了一套，我则是有幸集齐的第三人。最近几年，海道十四治先生不幸患了肺癌，病危期间，他邀我前往日本，但由于种种

原因，我未能成行。海道十四治先生临终前，嘱咐夫人在他过世后，将自己收藏的所有烟标无偿赠送给我。2000年5月，海道十四治先生的夫人专程来到苏州，将1万多种烟标（只是一部分）送到我手中，其余的分批送给我。接过烟标，我深深感动，海道十四治先生是位成就非凡、德高望重的烟标收藏家，他的所作所为使我感悟到，收藏烟标是没有国界可分的，珍贵的友谊更不是国界可以界定的！

由于张家伟的意志和毅力，他先后与20多个国家近千名收藏家有了来往。韩国集友李昌性是个海员，喜欢收藏砚台，知道中国制砚历史悠久，品种也极精良，可惜一直没有机缘结识中国朋友。当他从日本的《烟趣》杂志上获悉张家伟是中国著名的烟标收藏家时，一次就寄来了2套极珍贵的“太阳牌”烟标，价值达200多美元，并将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张家伟。张家伟接信后，专门腾出时间为韩国朋友寻觅精美的文房四宝，用精致的木盒邮寄出去。从此，两人鸿雁不断，结下了深厚友情。

张家与烟标收藏世界冠军意大利的克劳地沃结识，也是靠《烟趣》杂志做的“媒”。通过对世界烟标收藏的评点，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克劳地沃的家庭堪称“烟标世家”，他本人也已收藏烟标40余年。张家伟从克劳地沃那儿学到了许多关于收藏烟标的方法和保养技巧，两人的友谊与日俱增。有一次，张家伟寄给克劳地沃150枚烟标，其中包括我国解放前20多个珍贵的品种。克劳地沃十分高兴，将世界稀有的“安道尔”烟标寄赠给张家伟。这对十分亲密的跨国集友，至今保持着友好关系。

在张家伟的收藏室里，我有幸见到了国内外许多几乎已绝迹的珍贵极品烟标。如我国最早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金龙”烟标，华成烟草公司的“美丽”烟标，1902年于上

海出产的“品海”烟标等；国外的有令人拍案叫绝的韩国“寻人”烟标系列，美国“四七”世界无烟日的特供黑色“死亡”牌烟标，英国最古老的“三炮台”烟标，法国最富新意的“阿里埃尔”烟标，被誉为最高意境的意大利“加拉”牌烟标，还有联邦德国的人物肖像系列烟标、匈牙利以爱情为题材的珍贵烟标等，无不体现了张家伟烟标收藏的厚度、广度以及超人的品位与水准。

为此，中国收藏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及华夏收藏家联谊会几乎每年都邀请他参加和举办各种展览。他也因此被评选为“中国民间十大杰出收藏家”、“全国烟标收藏界头名状元”。国际收藏家协会授予他“国际金奖收藏家”称号。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拍摄了他的专题片《中国烟标艺术》和《世界烟标艺术》。

正当张家伟的烟标收藏进入峰顶之际，他被调往收藏艺术的殿堂——民俗博物馆，从事专业收藏与陈列。这对于张家伟来说，如同猛虎添翼。

延伸空间

在烟标收藏的道路上，张家伟就像一名长跑运动员。然而，当他的收藏在数量与质量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时，他又像一名跳高运动员，即使再要跃上1公分都显得难而又难。

面对这种情景，张家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从此放弃，好在自己已是位成功者，该得到的荣誉全得到了。将收藏的烟标无论卖给国内或国外，都可以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成不了大富，也足可成小富，以报答一向支持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们。二是继续跋涉在收藏烟标的征途上，但难度会越来越大，成效会越来越小。